※ 余英時院士紀念專輯 ※

余英時論中國文化和自由民主接榫的精神資源

丘慧芬 *

余英時先生二〇二一年八月一日離世的消息公布後，不但西方、日本與中文知識及文化界有追思的文章與紀念論壇來回顧他走過的學思之路和卓越的學術貢獻[1]，有關他的首部傳記和訪談錄，也都在之後的兩、三個月相繼問世[2]。更有余先生的學

* 丘慧芬，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系教授。因蔣經國基金會的支持與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的敦促及鼓勵，筆者方能如期完成本文，謹此一併致謝。

1 因敬悼的文章與追思紀念會相當多，此處僅以幾個例子為代表：在美國有 *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特別請他們的專欄記者 Chris Buckley 在 2021 年 8 月 13 日訃聞欄頁 B10 寫了一篇長文介紹余先生的學術成就與貢獻；*Financial Times*（《財經時報》）中文網 8 月 30 日也登出趙尋撰寫〈余英時留給中國大陸的大哉問〉的專文，網址為：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93745?adchannelID=&full=y&utm_source=HRIC+Updates&utm_campaign=a5a9891d3c-HRIC_DAILY_BRIEF_COPY_01&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b537d30fde-a5a9891d3c-250138429；另有美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在 2021 年 8 月 28 日主辦的追思紀念會，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jBfkWlWP9c。在臺灣有聯經出版社主辦、臺灣《思想》雜誌、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協辦，以及《報導者》、《端傳媒》、《風傳媒》和社交媒體 Matters 的共同協力，在臺北時間 2021 年 9 月 4-5 日舉行了兩天「敬思想史的傳薪者——余英時先生紀念論壇」，報導見：https://www.linking.vision/?p=4252，有關的資料整理見：https://matters.news/@Zhizhu_2019/ 敬 - 思想史的傳薪者 - 紀念余英時先生的線上論壇資料整理 - 一 -bafyreihbbs2gwechevi3snveagvvndyysknvhi3ktu4ugz4ewfepu4pf7u。在香港，《明報月刊》2021 年 9 月號刊出「一代文化巨星的殞落：敬悼余英時先生」的特輯，並邀請余先生好友及學生撰文紀念。筆者要特別謝謝香港中文大學周保松教授惠贈此一特輯。筆者也要謝謝余師母陳淑平先生告知日本《朝日新聞夕刊》在 2021 年 10 月 27 日在「會員記事」欄刊出村上太輝夫 10 月 23 日寫的訃聞短文。短文題目是：〈（惜別）余英時さん　米プリンストン大學名譽教授〉。文中用了「巨星墜落」的象徵來刻畫余先生離世對華人世界的損失，同時並介紹了余先生的生平、論著以及其對共產主義的批判立場，見：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5087266.html?iref=pc_ss_date_article。

2 見臺北印刻文學出版社在 2021 年 10 月發行，由北京清華大學周言所寫《余英時傳》。臺北允晨

生以「不剃鬚」的方式為老師守喪[3]。余先生以九十一歲高壽在睡夢中安詳過去，是余師母陳淑平先生所說「能無疾而終」的「福報」[4]，不過華人社會，特別是中國大陸知識與文化界在獲悉這個消息後，仍有許多難掩的哀思與敬悼之情。這樣不比尋常的悼念之情，從北美、香港、臺灣和中國大陸各地學者及文化工作者，在余先生逝世一個月後參與臺北聯經出版社主辦的「敬思想史的傳薪者——余英時先生紀念論壇」上的發言也都清楚可見[5]。

不認識余先生的人，看到一位學者受到這樣的景仰和追思，大概會問道，為什麼會有這個他們可能從來沒見過的現象。對我來說，這個獨特現象的出現和余先生一生為追索中國文化的現代命運所付出的努力和研究成果，以及他無懼中共政權，總是堅持以自由民主的原則為公義發聲並且熱心助人的行動，都是密切相關、彼此相連的。熟悉余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在學術思想上的成就讓他在獲得二〇〇六年美國國會克魯格史學人文獎時，被譽為是「我們這一代最了不起的中國思想史學家」。他的批判言論和助人行動，也讓他在二〇一四年獲得首屆唐獎漢學獎的褒揚時，被稱作是一個「公共知識份子」[6]。這兩個讚譽的指謂雖然不同，但卻給了我們充足的理由去將余先生看作是華人社會中「創造的少數」和一個良心的代表[7]，進而

文化公司接著在 11 月中旬也發行由李懷宇在余先生生前所做的訪談《余英時談話錄》。

3 這位學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黃進興教授，目前亦為中研院副院長。不剃鬚是他在接受採訪時提到的守喪方式。見黃進興：〈至聖與先師——追憶已故史學泰斗余英時〉，聯合新聞網／研之有物，2021 年 11 月 13 日，採訪撰文者為莊崇暉、郭姵君；美術設計為林洵安。網址為：https://udn.com/news/story/12681/5887730。

4 見丘慧芬：〈「為追求人生基本價值而付出努力」的典範知識人——敬悼余英時先生〉，刊於《聯經思想空間》，2021 年 8 月 13 日。網址為：http://www.linking.vision/?p=2532。

5 有關這個紀念論壇的發言，見 Matters：〈敬思想史的傳薪者——余英時紀念論壇資料整理〉，網址：https://matters.news/@Zhizhu_2019/ 敬 - 思想史的傳薪者 - 紀念余英時先生的線上論壇資料整理 - 一 -bafyreihbbs2gwechevi3snveagvvndyysknvhi3ktu4ugz4ewfepu4pf7u。

6 這些讚譽的資料，見丘慧芬：〈承負、詮釋與光大中國知識人傳統的余英時〉，林載爵主編：《如沐春風：余英時教授的為學與處世——余英時教授九秩壽慶文集》（以下簡稱為《如沐春風》）（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9 年），頁 64-96，特別是頁 67-68。

7 余先生曾引湯恩比 (Arnold Toynbee)「創造的少數」(creative minority) 一詞來刻畫中國古代一些少數的「士」。因為他們在彼時占有主導歷史潮流的地位。見余英時：〈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知識份子的原始型態〉，《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 年），頁 53。余先生在此書所載〈中國知識份子的古代傳統——兼論「俳優」與「修身」〉一文中亦認為，西方近代知識分子批評社會之憑藉，往往只是個人的「知識良心」（頁 77），顯然，余先生認為，知識分子的批

肯定余先生是中國知識人價值傳統的承負、詮釋與光大者[8]。根據這樣的理解，筆者也認為余先生近七十年的歷史書寫和時論文字，為儒家人文傳統在現代的存續找回了原有之魂。這個原有之魂，指的就是余先生針對春秋時代由孔子開啟「內向超越」途徑，使每一個人都可以接觸「道」或「天道」並與之合而為一，所提出的突破創見。孔子相信每個人內心都有得自於天的「仁」或者「德」。通過內心的仁或德，每個人都可以努力去和價值本源的超越之道產生直接的連結。這個往內尋求價值本源的「內向超越」，一方面突破了孔子之前只有君王可以與天合一的權利，一方面也為儒家思想建立了天道是向每個人開放的基本立場。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余先生二〇一四年討論「天人之際」的專書，就不僅可解讀作是一本說明中國文化何以稱得上是「軸心文明」的代表作，也應該看作是為儒家人文傳統找回原有之魂的一部原創論著。據此，我們也就可以再進一步將這個原有之魂解釋作是古典儒家認為天道之前人人平等的一種原初精神[9]。顯然，這種原初精神標示出的是中國文化內部的一個獨特面向。更關鍵的是，這個面向原本已經內蘊的普世價值，正是因為透過余先生在這本二〇一四年專書中的探勘追索，才清楚完整的呈現了出來。如此看來，余先生採用德國哲學家雅思培 (Karl Jaspers, 1883-1969) 所說「軸心文明」的概念來論證中國文化本有的普世價值，實在是其來有自，且又順理成章的。其實，只要仔細閱讀余先生二〇一四年《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的這本代表作，就會發現他是根據孔子、孟子和莊子思想中對天、人可以「合一」的相近看法，去探究說明這種原初精神內蘊的旨意。因為筆者已有另文探討余先生這本專書的原創意涵，此處就只提出基本重點而不再贅述[10]。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余先生並非只在他二〇一四年的專書中討論中國文化中最突顯的特色，事實是，他在一九八四年就已經發表了一篇討論中國文化特色的重要專文。他當時寫道，中國文化是「把人當作目的而非手段」，而且認為，中國文

判言論代表了一個社會的良心。

8 見丘慧芬：〈承負、詮釋與光大中國知識人傳統的余英時〉，頁 64-96。

9 原有之魂是筆者在〈「為追求人生基本價值而付出努力」的典範知識人——敬悼余英時先生〉的文章中提出的。網址：http://www.linking.vision/?p=2532。

10 見丘慧芬：〈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從余英時「天人合一的新轉向」說起〉，《思想》第 38 期（2019 年 9 月），頁 39-85，特別見頁 48-65；另可參考丘慧芬：〈承負、詮釋與光大中國知識人傳統的余英時〉，頁 64-96，特別是頁 72-79。

化的發展顯示出每個人自身都有他或她的「道德價值」。同時又引用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和王陽明「滿街皆是聖人」的說法，來表明中國文化事實上已經發展出明顯的「平等意識」。他接著提到孔子對「為仁由己」的堅持，以及其後持續出現的「講學議政」現象，都是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發展出的一種「自由傳統」[11]。余先生當時雖然指出，中國文化本身發展出了平等意識和自由傳統，但他主要的目的卻是在表明這個平等意識和自由傳統「都是中國民主的精神憑藉」，而且都是「可以通過現代的法制結構而轉化為客觀存在的」[12]。顯然，余先生當時的核心考量，是要說明中國文化經由孔子、孟子和其他諸子在先秦的講學議政所發展出的平等意識和自由傳統，和西方現代的自由民主在精神上是相通相合而不是悖反互斥的。更重要的是，他堅持這兩個傳統的精神資源完全可以經由結構性的轉化，而在現代法律制度中成為真實客觀的存在。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可以明瞭，為什麼余先生在他不同的論文和專書中，經常會強調，儒家以人為本而發展出的人文思想，可以作為現代中國發展自由民主的基礎性資源。也就是說，他認為「人文與民主」可以作為互相支援的力量，去協助建設一個合理及健康的現代中國[13]。

應該指出的是，余先生對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平等意識和他有關講學議政之自由傳統說法，絕不是出於一種隨意的比附。早在一九五〇年代，他其實就已經注意到中西觀念都有各自不同的歷史脈絡，而且他也清楚「即使同樣的名辭其涵義也難免有些出入」。不過，他同時強調，不同系統的思想史確實會有內涵互通的共同觀

---

11 這篇 1984 年的專文原為余先生在臺北《中國時報》舉辦的系列講演中提出的一個總結。《中國時報》當時因為此文的影響極大，且為「一般有識之士」稱作是「世紀大文章」，即「鄭重」刊載於該報 1984 年元旦的報刊，隨即又以單行本印成發行。見余英時：《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4 年）。有關此專文以單行本發行之說明，見該單行本，頁 1-2。平等意識與自由傳統的引文見單行本，頁 82。此單行本著作後收入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年），頁 1-51，此處引文見頁 36。余先生後來在其 1995 年由臺北三民書局出版的《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一書第十二章中討論中國近代個人觀的改變時，也提到胡適認為，孔子「為仁由己」的說法「相當於一種自由意志」，見該書頁 204。

12 見余英時：《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頁 82；《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頁 36。

13 筆者在〈承負、詮釋與光大中國知識人傳統的余英時〉一文對此已有說明，見林載爵主編：《如沐春風》，頁 89-90。關於余先生本人在不同論文中對此一看法的解說，見其《人文與民主》（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0 年）一書中的文章。

念。因此，只要研究有需要，援引西方觀念來支持或是說明自己的論證，完全可以成立，而不應看作是曲解原來不同系統觀念的一種穿鑿附會[14]。余先生後來在說明自己如何詮釋中國思想傳統在現代的意義時，也主張研究中國的思想傳統「必須通過現代的詮釋才能在世界配景中顯出它的文化特色」。他還特別指出，在詮釋的過程中，我們不可能、也不需要「避開西方的概念」。而且他本人在研究中即使會引用西方概念和學說，這些概念和學說事實上也都只有「緣助性」的作用，完全不影響他的基本立場。他說的這個立場，就是根據具體的歷史材料和「中國傳統及其原始典籍內部中所呈現的脈絡」去研究中國傳統的動態，以彰顯其獨特面貌的一個原則[15]。余先生這裏強調的立場，是從研究方法的面向來進行歷史研究的一個基本原則。不過，從歷史研究的實質意義來說，我們就會發現余先生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的一個陳述中也提出了他本人的一個明確立場。他當時說：「我是偏袒人文主義的」，又說他「堅信歷史文化的最大意義乃在於它提高了人的價值」[16]。余先生這個信念顯然成了他一生追索中國文化內部本有的平等及自由精神資源，如何可以通過現代民主的法律制度來具體落實的根本動力。

有趣的是，余先生在他一九八四年專文出版後的三十年間，雖然不斷有重要的論著問世，但一直要到二〇一四年他發表《論天人之際》這本著作去追溯古代中國思想史的起源時，我們才會看到余先生提出關於孔子如何突破由君王壟斷天命的權利，並轉向去開啟「內向超越」且確立「天命個人化」的系統性論述。這個論述雖然以孔子為思想史的啟動者，但也涵蓋孔子之後孟子與莊子都一致肯定天命是向每一個個人開放的立場，以及余先生自己對此一立場的細緻說明。事實上也是因為通過這個完整的系統論述，我們才有更加充足的理由去判定，余先生的確是認為中國文化的原初精神內蘊一種具有本體意義的平等意識。這裏我們可以追問的一個問題是：余先生對他關於中國古代講學議政的自由傳統，是否也提出過同樣完整的系統性說明？

眾所周知，不論是孔子、孟子、莊子，或是其他先秦諸子，都曾經針對他們

---

14 見余英時《文明論衡》，臺北九思出版公司 1979 年根據 1955 年版本重新刊行，此處討論可參考頁 59-60。

15 見余英時為其《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一書所寫之〈自序〉（頁 1-8），引文見頁 7。

16 見余英時 1953 年出版《近代文明的新趨勢》一書第一章，收入《余英時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 6 卷，頁 125。

所處的時代從不同的角度提出批判性的言說。我們也都知道，儒家自孔子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之後，就有一種「以道自任」的理想精神使他們可以超越己身，甚至可以超越群體的利益去針砭時弊，並發展成余先生說的一種「對整個社會的深厚關懷」[17]。這樣的關懷，不但呈現出「一種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18]，也有助我們了解孔子和之後儒家知識人的批判性言論，何以會吸引許多願意跟從他們學習的弟子門生。毫無疑問，孔子本人是這個以道自任的原創者，更是以道議政的一個原型代表。我們只要閱讀《論語》，或是之後的《孟子》，就會看到孔子與孟子對當時政治的批判言論都和他們講學的內容互有關聯，而且他們講學的內容也都留傳後世，成了儒家傳統中的兩個重要的經典文本。不過，我們此處更需要關注的焦點卻在：孔子、孟子或當時的其他諸子，在對各國君主的治理提出批評的議論後，都可以合則留、不合則去的事實。這個事實當然就是余先生筆下講學議政所揭示出的那個「自由傳統」的指標內涵。不過，對余先生來說，要真正深入這個自由傳統的精神底蘊就必須注意其中涉及的一個制度面向，那就是戰國時代稷下學宮的出現。

余先生是在他一九八〇年出版《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專書中的第一章，探討了稷下學宮在齊國興起的歷史背景。余先生同時也說明了這個學宮的發展和其代表的重大意義[19]。他指出，稷下學宮的出現和戰國早期各國君主為了富強而禮賢的現象，有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當時為了爭取一些自由流動的賢士之助，有些君主既可以將願意「居官受祿之士」收作臣子，也可以和一些無此意願之士建立起介乎於「師友」之間的關係。那些堅持以師或友的關係作為和君主往來之士，就展現出余先生所說以道自尊，或堅持道尊於勢，甚且以道抗勢，或以道抗位的一種態度與立場。至於一些絕對不肯和政治權威妥協之士，也自然會成為君主眼中具有「高度危害性」的人物。余先生指出，就是在這個歷史脈絡之下，彼時的齊國為了舒緩「道」與「勢」之間的張力，同時更為了能獲得賢士之助以強兵富國，才會出現建立稷下學宮的創舉。

有關稷下的史料雖然有限，但根據余先生的說明，我們知道遊學稷下者在當時

---

17 見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年），第一章〈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頁 1-108），引文見頁 39。

18 同前註，頁 40，特別見該頁之註 89。

19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有關稷下學宮的興起、發展和意義，見第一章〈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頁 57-76），特別是頁 62-75。以下有關的討論皆出自此，請逕行查閱。

會被稱作學士，他們的前輩就被稱作先生。這些稱謂表明齊國當時的君主，亦即齊宣王，不但沒有將他們視為官僚系統中的從屬臣子，反而給了他們「爵比大夫」的禮遇。因為有了官方在制度上給予的禮遇，這些稷下學士也就可以享有遊學講學和「不治而論」的真正自由。換句話說，就是可以自由地對彼時國事或政事提出尖銳的批判性議論。稷下學士的生活既然有所安頓，而且議論政事的自由也獲得制度性的保障，余先生因此判定，稷下學宮作為一個制度的出現，特別是學宮給予自由議論制度性的保障，已經顯示古代士的功能至此確實「發揮到最大可能的限度」。他因此也認為，學宮「在中國文化史上」已經明確建立起了一種「永恆的」意義。余先生非常清楚，這種自由議論且以道抗勢的黃金時代，在秦國統一各國之後就成了再也不能復返的曇花一現。他當然也清楚，秦漢有「博士制度」的設立。不過，對他而言，秦漢雖然建立了博士制度，而且形式上也保存了戰國養士的傳統，然而，博士和稷下學士卻已經有了根本性的歧異。因為博士在秦漢官僚組織中已經成為不折不扣的一名屬官，根本不復再有稷下學士那種「不治而論」的自由身分和地位。正是秦漢博士這種性格上的質變，讓余先生毫不猶豫的斷定，戰國講學議論的自由傳統到此就等同終結而無以為繼了。余先生當然知道，秦以後的中國歷史仍然出現過無數知識人議政的批判言論，但他們論政的結果多半都以悲劇收場卻也是不爭之實，更不用提帝制中國崩解後的現代知識人，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知識人在毛澤東統治的中國大陸下曾經遭受的不堪遭遇了。我們都知道，中國大陸一九八〇年代後已經告別毛時代的極端社會主義，但當中國大陸今天仍然要以強勢維穩作為政權鞏固的必要手段時，言論自由顯然不是任何個人可以視之為當然的基本權利，遑論爭取言論自由所須付出的代價。對照之下，中國文化本有的平等意識和自由傳統，明顯是只有在今天的民主臺灣才獲得了法律上的具體落實。當然，臺灣的民主還有各種難解甚至無解的問題，但毫無疑問的是，臺灣公民的基本人權和言論自由，的確已經受到法律上的維護和保障。這個事實一方面印證了余先生對中國文化本有的兩種精神資源是完全可以和現代自由民主接榫的論斷，一方面也顯示，他的研究對我們理解人文與民主在現代可以互相支援且共同發展，仍然具有深遠的相關意義。僅僅只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應該也可以再次肯定地說，余先生一生對中國文化現代命運所進行的探索和研究，確實為我們這個時代留下了一座難以超越的里程碑。